

试论容闳爱国主义的曲折道路

袁 汉 巨 陈 申 如

容闳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放弃舒适豪华的西方生活，立志终生献身于西学东渐，“维新中国”。从他回归祖国探索救国救民开始，历经教育救国、变法立国，直至晚年投向革命，始终渗透着容闳的一颗爱国之心。这正是容闳的伟大之处，也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和后辈继承发扬的。

容闳自幼由传教士勃朗先生带往美国，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升入耶鲁深造。在大学期间，他半工半读，成绩优异。他在自传中说：“常思籍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由此可见，容闳留美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为了报效国家。他大学毕业后，拒绝了各界的优厚的招聘，返回祖国，开始了他一生中“无疑是非凡的”事业，走上了为西学东渐而奋斗的历程。

1857年，他在任某英商公司书记期间，时闻外国列强“以强权蚕食我边疆，扩充其势力”；容闳大声疾呼清政府“若不急谋防范，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表露了一个海外赤子强烈的爱国心。然而他的声音是微弱的。腐败的清王朝“防民甚于防寇”，始终将视线放在对人民反抗的防范上。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给他带来了一丝新的希望。

1860年，他直上天京察访，沿途看到“官军之残暴”和太平军秋毫无犯的军纪，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同情农民革命，並一度想成全太平天国事业。他曾向天国领导人提出治国措施和建国蓝图。他主张：“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将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习学校。”这是容闳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救国纲领，初步展示了中国如何实行资本主义的设想。他表示“苟决计实行予……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但容闳的这些设想与太平天国农民们的理想是有距离

的，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为主张平均主义的小农思想的天朝英雄所接受。

容闳的另一“夙愿”，就是教育救国。他通过自身的实践，认定走这条路是行之有效的救国之道，“舍此计划，实无救亡之良策”。

容闳的教育计划，蓄志已久。早在读书期间，他“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1860年，容闳向老友洪仁玕提的七点建议，其中四点谈的都是教育。事隔八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条陈四则”，一、三、四则不过是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第二条的内容，就是容闳的教育计划。他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名额以试行之。此外还对留学生的要求、管理、教育、经费等等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他把这个计划的实施，看作是“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

容闳的教育计划被搁置了三年。1870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鼎力协助下，清政府经过激烈辩论，勉强同意拨款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化二十年时间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容闳被派在留美事务所工作。他提倡教学民主，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藉西方文明之学术”，达到“维新中国之目的”。

顽固派不能容忍容闳过多地插手学生事务，千方百计地凭借手中权力排挤他。不久吴子登利用美国的排华政策，主张立即解散留美事务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他的建议得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一致赞同，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流产。1875年秋，当最后一批留美学生抵达后，清政府未经容闳同意，将他调到驻美使馆，任副公使。名义上提升，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对此，容闳是察觉的，“今发初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他据理力争，宁可辞去驻美副公使，也不愿调离留美事务所。1876年，清政府任命吴子登任学生监督，目的是想控制这支留美学生队伍。这是清政府有意安下的一枚钉子。

吴子登历来“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为高

经叛道之举”。他接任后，以封建卫道士自居，对“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甚至不惜采用特务手段，向上告密，陷害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他危言耸听：“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有害于社会”。

教育救国的流产，是对容闳思想的第二次大震动。他醒觉到：“中国根本上之改革”，已是“不容稍缓之事。”他从沮丧中振作起来，重新卷入救亡图存的旋涡，奋力挣扎。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订立《中日马关条约》。条款公布后，朝野大哗。爱国的知识分子推举康有为连夜起草“公车上书”，呼吁光绪帝变法图强。从此揭开了戊戌变法，改良图存的序幕。身居大洋彼岸的容闳，密切注视故国政局，他再也按捺不住，为了响应康梁的“变法救国”的主张，他又一次远渡重洋，返回祖国。一踏上中国大陆上海，容闳专访了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谓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所谓新政策，就是变法自强之法。但容闳的建议未被采纳，容闳力图通过封建上层的洋务官僚来实施他富国强兵的宿愿，往往是徒劳的，是一种空想。然而他一点不灰心，为了配合康梁在北京的变法维新活动，他在南方挥笔倡议清政府“设立国家银行”，尽力与康梁南北呼应，以促变法之成功。

1898年，在全国爱国舆论的压力下，光绪帝开始亲政，重用康梁等维新派，力主变法图强。戊戌变法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容闳得悉后，喜出望外，不顾辛劳从上海北上首都，汇合到戊戌变法的潮流中去。到京后，容闳与康梁会面，志同道合，相处甚笃。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所发布的一百多条维新法令中，好多是出自容闳策划和他的手笔。不久，百日维新在顽固派的进攻下失败。光绪帝软禁瀛台，康梁流亡国外，戊戌六君子上了断头台，容闳也被清政府列为通缉名单，他潜往香港，这对容闳的爱国热情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不气馁，他还错误地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已废的光绪帝和康梁等保皇派身上。不久，参加自立军，并任会长，自立军失败后再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他重新回顾以往所走过的历程，对自己所作的一切作了深刻的反省，他猛醒过来。他与改良保皇派断然决裂，站到孙中山革命派一边，这是容闳一生立志拯救中国的最大的转折，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转折。容闳在实践中认识到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信赖之维新人物”，“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信徒”。他对孙中山不仅更为器重，而且向孙中山

靠拢，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很重实际人物，为广东之干才”。从此他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程，开始了容闳成功的归宿。为了使孙中山革命早日成功，1909年容闳在美国旧金山制订了一个宏大的《红龙计划》，向华侨捐款500万美元、10万支枪枝、一亿发弹药，以加速革命的进程。此时孙中山旅居新加坡，与容闳通信频繁。不久，孙中山曾到纽约和容闳一聚。1910年2月，容闳致书孙中山，正式提出《红龙计划》的具体步骤：“1.向银行贷款150万到200万作活动基金；2.成立一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之人，以管理占领之城市；3.任用一有能力之人以统率军队；4.组训军队。”为此孙中山又重访美国旧金山，并转洛杉矶，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荷马李、查尔斯·布恩会谈多次。同时容闳也几次去荷马李、查尔斯·布恩处，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孙中山的立场，并督促他们迅速筹款，使《红龙计划》早日付之实施，遗憾的是此动议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达成协议。然而从这宏大的《红龙计划》中可以看出，容闳虽已年迈，力不从心，但他的爱国之心未减，仍竭尽全力，促成美国友人支援中国革命，牵线搭桥，其用心良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清廷土崩瓦解，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致电容闳，要他回国参政。此时容闳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心有余力不足，不堪长途跋涉，写信给革命党人，热烈欢呼这次革命。他认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大革命”，“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提醒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他的预见，为后来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容闳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他的一生，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爱国爱民，不卑不亢，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功名利禄观念，始终不渝地献身于祖国的富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他是一位“热情进取的人”，他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前进，披荆斩棘，从不气馁。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的历史”。容闳最初重视实业救国、教育立国，后来他走上了从政道路，终于从一名普通的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共和国的斗士。他所走的是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代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他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为子孙后代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名字永远载入史册，为后人所崇敬和怀念。